

[设计创新与应用]

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村镇文化记忆的内生逻辑与当代建构研究

黄伊涵, 陆小波, 顾平

常州大学, 江苏 常州 213000

摘要: 中国大运河沟通五大水系, 对沿线地区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都起了巨大作用, 深度研究大运河文化记忆的内生逻辑与多元价值, 为大运河江苏段名镇名村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利用提供学理支撑。重点考察大运河与城、镇、村之间的关系, 从水岸共生、水运文化共生两个维度, 分析了大运河沿线名镇名村空间结构与大运河水系格局之间的关联性, 阐述了大运河江苏段名镇名村文化记忆的内生逻辑。大运河漕运促进了沿线城乡的兴衰与繁荣; 大运河水网形态、空间格局影响着人的审美感知; 大运河南北水系贯通促进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交融。大运河文化记忆规范着两岸村镇景观语言符号的合理性、真实性与完整性, 成为数千年来城乡持续发展的内在准则, 成为数千年来城乡持续发展的内在准则, 成为激活大运河沿线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 大运河; 名镇名村; 文化记忆; 内生逻辑

中图分类号: J5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6946(2024)01-0070-08

DOI: 10.19798/j.cnki.2096-6946.2024.01.009

Endogenous Logic and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Memory of Towns and Villages in Jiangsu Province Among the Grand Canal Basin

HUANG Yihan, LU Xiaobo, GU Ping

Changzhou University, Jiangsu Changzhou 213000, China

Abstract: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connects the five major water systems, which has played a great role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s along the Canal. The work aims to deeply study the endogenous logic and multiple values of the cultural memory of the Grand Canal, and provide academic support for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utilization of the culture of famous towns and villages in the Jiangsu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and Canal and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famous towns and villag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and the water system pattern of the Grand Canal is analyzed from two dimensions: city and river symbiosis, and river transport and culture symbiosis. The endogenous logic of the cultural memory of the famous towns and villages in Jiangsu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is expounded. The canal transport promotes the rise and fall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long the route. The form and spatial pattern of the Grand Canal water network affect people's aesthetic perception. The connecting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water systems of the Grand Canal promotes the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regional cultures. The cultural memory of the Grand Canal regulates the rationality, authentic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landscape language symbols of villages and towns on

收稿日期: 2023-07-22

基金项目: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大运河江苏段名镇名村文化记忆的保护利用路径研究》(102920);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21SJZDA106); 江苏高校文化创意协同创新中心第三期建设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XYN2202)

both sides of the river, and becomes an internal criter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an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activating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owns and villag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Key words: Grand Canal; famous towns and villages; cultural memory; endogenous logic

2014年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发表重要讲话,这些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文化记忆”理论将“记忆”引入文化学研究框架内,与社会、文化因素链接起来,让当地民众在对共同过去回忆的过程中,感觉到一种特别的约束力、认同感与归属感,具有凝聚性结构,大运河遗产成为文化记忆的聚集地和贮存载体。从科学视角看,中国大运河(简称大运河)的文化记忆集航运、灌溉、防洪、漕运、商贸等复合功能于一体;从经济视角看,古代中国大运河漕运及漕运制度深刻地影响着运河沿岸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城市功能也随之演变;从文化视角看,大运河纵贯南北五大水系,沿线八大省(市)分布着多元的文化类型,如“京津、燕赵、中原、齐鲁、楚汉、淮扬、吴越”^[1]不同地域文化形态融合共生,千年文脉绵延至今,拥有国家级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千余项。然而,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历时千年,空间跨度大,各省市分段管理,文化资源碎片化现象突出。江苏作为大运河与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重点建设区,肩负着责无旁贷的时代重任,只有深度理解大运河文化记忆的内生逻辑,深度阐释国家文化标识视域下的江苏地域文化整体特征,才能为大运河江苏段文化记忆的当代建构提供实践样本。

一、大运河江苏段镇村文化记忆内生逻辑

在地理学视角中,中国大陆的自然环境、地理结构是中国社会形态构成的基石,江河湖海、山川丘陵、平原岛屿、沙漠盆地等多样性的地形地貌,在人与自然的双向作用下,决定了村镇聚落择址的多态性,而且还是分等级的,可分为“乡村型聚落、城镇型聚落,基本类型有坡地型、岗地型、台墩型、湖泊型、复合多态型^[2]”。据“长江下游距今7 000—5 000年古遗址分布图^[3]”分析,中国早期古村落遗址基本上是沿河聚集分布的,大都通过主干或支流与大运河相连通,大运河及其支线周边的水系将沿城镇村连珠成线,形成了聚落集群链式网络,承载了独特的水岸共生关系,塑造了具有流向多变的长三角“平原河网水系特征^[4]”。大运河江苏段以大运河为主轴大动脉,主轴与支线、城市河道、内河、

湾汇、洲等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水体网络,运河支线将沿线的江河湖海联通,区域内河流交错,湖泊众多,水系形态与聚落空间交融互生,凝聚成集体的文化记忆,具有精神凝聚性和象征性特征。大运河江苏段沿岸镇村聚落空间结构与大运河水系之间存在着人水相依的关联性,一般可分为三种格局类型:运河穿城、运河傍城、运河望城。

(一) 运河穿城

“运河穿城”指京杭大运河穿越城镇而过。南临太湖、北依长江的无锡和常州就是运河穿城的典型城市,在古代,无锡属于常州府,凭借江运和漕运的地理优势,成为江南鱼米水乡向北方赋税之重镇,大运河主轴穿越或者毗邻城市核心点空间,水系环状绕城,并经过支运河向外发散。然而这两个城市空间结构仍存在各自特点,其最大不同是大运河分支水系骨干的形态不同。无锡城市的河道体系呈现中心向四周放射状形态,而常州城市的河道体系呈现鱼骨式丰字纵横形态。城市面空间的序结构又与大地山水地理形态有关,无锡城市面空间序列结构发展最终受到太湖水域形态的制约,而常州城市面空间的序结构发展最终会受到太湖及长江水体形态的影响。

运河穿城,村镇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形成水网纵横的江南水乡,其“小桥流水人家”村镇建筑特色的形成,受到了水乡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因素和文化特征的影响。这一地区的村镇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人文荟萃,土地稀缺,水乡村镇历来是官商退隐、学士散居之地。江南水乡村镇建筑多以一、二层木结构为主,其朝向多数朝南或东南,村镇建筑大多数采用借街用河,有的前街后河、前店后坊,或者上宅下坊、前后披屋,或者沿河建阁楼或吊脚楼,当时的儒学伦理、风水习俗都直接影响建筑形制和室内房舍的平面布局。段进^[5]教授借鉴系统学中“群、序、拓扑的结构概念”将环太湖区域城镇空间归纳为群结构、序结构和拓扑结构共性的古镇空间结构特征,通过围合和拼接构成方式,各层次要素出现了同构关系。水乡村镇临水建房,有的三进、五进,规模最大的多至九进,营建了“水街、水阁房、水墙、水门、水廊、水榭、水亭、水楼、青石板、石拱桥、石驳岸、埠头、码头^[6]”等特色造型,枕河人家,水岸

共生。建筑装饰粉墙黛瓦,就地取材,大多数都以木构架承重,梁架、门框、窗户等,有少数精致的木、砖雕刻加以装饰,简洁而素雅。

(二) 运河傍城

大运河主轴傍城而过,成为城镇重要的地理分隔要素,城市发展核心偏离大运河,其分支水系为轴穿越或环绕城市核心点空间,分支水系担任重要的城市轴线功能,“运河傍城”整体呈多组团式发展的空间格局。扬州、淮安都是京杭大运河傍城而过的典型城市,邗沟是扬州至淮安之大运河的前身,淮扬运河(又称“里运河”)的贯通及漕运的兴盛,支持了沿线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在江淮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人们对大运河漕运的理解、改造和利用,大运河的漕运与城市经济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体系,形成了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左传·哀公九年》记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开凿了邗沟。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统一,同时也为全国水路交通网络的建立和漕运制度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大运河在扬州段古称邗沟,从此扬州凭借其“襟带淮泗,控引江海”的地理位置,在经济上,就成了中国南北水路交通的要道、盐运中心和货物的集散地,是“国计民生所重系”的漕运要津;此时,大运河主轴还是水脉文化轴,扬州“磅礴郁积,人才奋兴”的深厚文化积淀,塑造了兼具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扬州运河文化,“为南北之冲,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7]”,扬州更成为绘画雕版印刷等领域的文化中心。

末口是扼邗沟入淮的要塞,成为链接江、淮、河、济四大水系的枢纽——北辰镇(即河下古镇的起源),河下镇在隋唐、明清因漕运、盐运而兴盛,当时这里曾有22条街道,13个市坊,91条巷子,数十处私家园林和寺、庙、观、庵。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就诞生在河下古镇打铜巷,而且这里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齐全,“进士之乡”又是淮扬菜系的一个重要发源地。史料记载,明代万历以前淮河一直是从淮安新城城北流过的,“经古楚州城北东北流,经安东州城南,东流入海^[8]”,淮安成为大运河“全国的漕运指挥中心^[9]”。大运河苏州段穿越长江三角洲太湖流域的腹地,分为三段,张英霖在《考辨苏州》^[10]中做了详解,自望亭的五七桥至枫桥为西段(苏锡段约18 km);原自枫桥经绕苏州古城闹市区,穿觅渡桥南下宝带桥为中段(市河段约14 km);南段(约50 km)原自宝带桥经吴江区所在的松陵、八坼、平望、盛泽于王江泾出省境,水网密布,南北走向,

与市河、大运河相通,给苏州带来了无尽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苏州虽也是运河傍城,但与扬州和淮安不同的是,近代以来的苏州,其发展因受到上海的辐射和牵引,而呈现东西向主轴发展格局,运河及其分支水系在城市面空间中扮演着网络联系的作用,也让苏州在科技创新上,独占鳌头,生机勃勃。

(三) 运河望城

“运河望城”指大运河与城镇之间呈现遥相呼应的空间格局,徐州、镇江和高邮是典型的运河望城城市,各自也有其自身发展特点。徐州城市主要的水系命脉为黄河故道,城市是围绕黄河故道而向两岸蔓延、逐步成长演化而来的,运河在城市边缘起到地理隔离的作用,大运河徐州段全长210 km,曾是运河漕粮的重要中转站,兵家必争之地。在镇江,大运河和长江交汇,古运河环城而过,通江的关河穿城而来。镇江则是受到长江东西向水系及南山的山体走势的共同影响,城市空间呈现出明显的东西向带状发展格局。南宋建都临安后,镇江是重要的军事港口,各路物资途经运河到临安的必经之地,成为江、河、海运输枢纽。交通的便利,也促进了当地商业和造船、酿酒、丝织等手工业的发展,元明清海运盛行,明初奔牛废闸为坝,百余年的漕运不走镇江,而多由孟渎入江,逆江而上百余里抵瓜州。

大运河连接了微山湖、骆马湖、洪泽湖、高邮湖四大湖泊,颠覆了高邮作为一个边远落后地区的形象,高邮作为江苏北部一个不大的城市,高邮湖濒临其西,自古以来是大运河重要的水陆码头,扬楚之咽喉,高邮城市与大运河空间距离靠近相望,紧邻大运河的一侧呈现半圆形,城市面状外轮廓及圈层扩展呈序结构。城市核心位于垂直大运河分支水系即东西向的北澄子河附近,但由于受到高邮湖带来的空间限制,高邮城市则呈现出与大运河互望的空间格局。高邮明清大运河故道北端,位于高邮市镇国寺之西的平津堰,始建于唐元和年间(806—820年),拦河蓄水,以济漕运,是目前大运河扬州段所发现唯一的堰。

综上所述,大运河形成河与海、河与江、河与湖、河与河等复杂的水网格局,影响着城镇聚落的空间结构,对村镇选址、空间格局、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以大运河为主轴统领分支水系,运河沿岸各类空间原型根据不同的组合方式,构成村镇空间的整体关系和原真性生态环境。可见,大运河沿线村镇空间形态变迁,一般都要经历“形成、壮大、扩张、协同四个发展阶

段,形态模式从带状伸展型向团状蔓延型、串珠状轴向拓展型、组团状多核型方向演化^[11]”。在这一过程中,大运河直接加速了沿运河城镇的兴起及城乡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二、大运河江苏段沿线镇村文化记忆的交融共生

大运河像一条金丝带,改变了中国文化封闭式的地理空间,从一个宏观视角阐释江苏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定位,有利于人们整体理解大运河江苏段在中国大运河文化线路中的文化共生关系。江苏人类文明历史久远,不仅是以长江为界南方文化圈与北方文化圈的交汇点,而且是横跨内陆和海洋文化圈的过渡区,成为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交流碰撞的前线。

(一) 村镇变迁因河而兴

江苏历史沿革经历了史前、春秋战国、秦汉、六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时期。史前至春秋战国时期,距今约30万年的“南京猿人”、新石器时期有青莲岗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春秋时期江苏分属于吴、楚、宋,战国时为越楚、齐的一部分,后归属楚国。以邗沟和鸿沟为主连接了黄河、淮水、长江等主要流域及其他各大水系,漕运业初见雏形,漕者“水转谷也^[12]”,专指统治阶级从国家管理的层面以水运来对粮食进行运输调度的工作所用的一个词,战争频繁导致吴文化、越文化、楚文化相互交融,形成军事文化与稻作文化。秦代江苏江北之地为泗水郡、东海郡和琅玕郡,江南之地为鄣郡和会稽郡,秦漕运兴起,楚汉文化基本形成并产生重要历史影响。六朝时期建都建康,史称“六朝”,使金陵文化产生全国性影响,北方居民南迁,吴地民风由尚武变为尚文。江苏作为一个行政区域的名称,“始于清代康熙六年(1667年),取江宁府和苏州府的首字组成”^[13]。之后,历史上大运河的两次大沟通,确保了物资运输、人流交通、文化交流和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

其一,大运河的第一次大沟通阶段(隋唐五代时期)。隋炀帝在前代汴渠的基础上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从南方重要农业产区直达中原地区政治中心和华北地区军事重镇的内陆水运交通动脉”^[14],在唐代呈现“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15]”水运交通的盛况。其二,大运河的第二次大沟通阶段(宋元时期)。大运河作为政府连接海外的重要通道,凸显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南北战争和黄河夺淮,对两淮地区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江北落后

于江南,元朝大运河重修,造就了江苏南北的共同繁荣。

元明清三代大运河漕运制度更加完善,元代运河初步开放,运输量不大,设有都水监以专管河渠堤防、水利、桥梁、堰闸等政务,同时漕运的组织和制度也得以进一步健全,还建立了海运组织及其各项制度。明朝继承元朝的制度,明太祖设立漕运使来加强漕运管理,设立了京畿都漕运司,以漕运使主管,并采用武职的官员来负责相关事务的管理。据嘉靖《吕梁洪志》记载,“江东民运白糙、粳、糯,每年过洪者:曰常州府及武进等四县^[16]”“明朝定鼎金陵,生事所资,赖长江以资转运,至满洲方面之军事补给,则由海运输送。”^[17]从当时的文献可以看出,江苏水路漕运体系业务之繁忙,河运线路也可谓是明王朝重要的生命线。漕运的兴盛使江苏地区政治地位提升,带动了社会经济的繁荣。清代大运河依旧为当时最重要的交通运输大动脉,尤其是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在明清时被人们称为“沿河四城”,足见其是当时在全国具有非凡影响力的城市。明清两代,大运河的商品流通地位日益彰显,商人辗转各地,从而实现了南北各地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然而,尽管清代每年都会将挖掘和疏浚大运河作为重要的工作,但是在交通线路上依旧沿用明代的规划,没有什么大的格局改变。清末由于朝政混乱,官员腐败,河道工程日渐松弛,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命令停止漕运,整个国家粮食及物资的主要运输途径,国家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也终于落下了帷幕。随着运输量的降低,昔日辉煌的运河变得到处淤塞,不再能够四处通达,过去的辉煌也成为历史记忆,清代后期(近代)沪宁沿线的发展,导致淮扬区域的边缘化。

(二) 地域文化因河相融

从空间上看,大运河江苏段在中国处于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众多的江河湖泊构成水运网络基础,各种文化圈在此交汇。对江苏省境内文化区域的划分,目前有二分、三分、四分、五分等不同的分法,其中“五分法”影响较大,将江苏地域文化分为“吴文化、金陵文化、徐淮文化、淮扬文化、苏东海洋文化^[18]”五大分区。为了展现苏江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空间特征的文化内涵,大运河江苏段以此类分法为依据,徐宿楚汉文化区、淮扬文化区、通盐连海洋文化区、宁镇金陵文化区、分设环太湖吴文化区,凸显地域文化原发性的生成语境和原创性的程式符号,体现出内涵丰富、多元包容、和而不同的水韵江苏文化气质。

汉韵楚风的楚汉文化区(徐州、宿迁)。徐汉文化

既是地域性的,又具有融合性,它与楚文化和汉文化的历史脉络紧密相连。尽管楚汉文化的内在含义、地位、形成过程及其分布的时空背景的研究仍存在争议,但是楚汉文化在徐州的形成这一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大运河徐州段是大运河江苏段北边的起点,与其相关的水系非常复杂,大运河对徐州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贯通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南方相融相通,运河文化与两汉文化相得益彰、与乡村文化相伴相生,徐州楚汉文化在大运河全线具有特殊地位,宿迁以其特有的西楚文化闻名于世。

繁华古朴的淮扬文化区(淮安、扬州、泰州)。据史料记载,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引江水入淮,将水系向北延伸,利用天然水道和湖泊,成功地实现了长江和淮河的连接。在东汉末年,由于邗沟的淤塞和运道的曲折,广陵的太守陈登决定改凿邗沟西道,将原先弯曲的水道改为直线,从而使江淮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便利。这条水道在过去的千年里,经过多次的拓宽和疏浚,直到今天仍在使用,基本上形成了今天淮扬之间运河南北的主要航道。蕴育繁衍出历史深厚、繁华古朴、丰富多彩的淮扬文化。

开放多元的苏东海洋文化区(南通、盐城、连云港)。苏东海洋文化区处在东南沿海长江和陇海兰新线所构成的主轴线的毗邻地段,辐射的城市有连云港、盐城、南通。这里的自然资源丰富,海洋渔业生态环境良好,气候和物种多样性鲜明,是中国海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所在地,也是重要的风力、潮汐等新能源开发基地之一,在“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中,均占据了十分独特的地位。

大气雍容的金陵文化区(南京、镇江)。以绵延于长江南岸的宁镇山脉为屏障将南京、镇江两个城市与太湖平原截然分开,山水林城。南京文化融汇南北,横贯东西,经历了六朝的兴衰,大气雍容华贵,底蕴深厚,红色文化资源独特,文化社会背景丰富,彰显都城遗风。镇江在古时被人称为“宜”,这是因为西周时期,周康王分封“矢”为宜侯,其他的称呼还有“朱方”“丹徒”“京口”“润州”“南徐州”^[19]等。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之始,镇江就立刻成为新兴的航运与贸易中心,造船业发达,经济繁荣,是长江下游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商业城市。

秀美灵动的吴文化区(苏州、无锡、常州)。吴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一个篇章,它源远流长,关于吴文化起源的争论,学术界并非统一。水

文化的智性和灵性滋养出吴文化秀雅聪慧、柔和细腻、精工巧作等典型特征。常州因运河而生,奔牛闸是京杭大运河常州段的咽喉,陆游《重修奔牛闸记》留下“苏常熟,天下足”的佳话,赞曰“儒风蔚然为东南冠”“方朝廷在故都,实仰东南财赋,而中吴尤为东南根柢^[20]”。苏东坡“眷此邦之多君子”十四次来常州,最后终老于此。大运河孕育了沿线村镇各具特色的工商文化、中医文化、齐梁文化、民俗文化、市镇文化、科举文化与红色文化等文化形态,是大运河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丽富饶的吴文化区是鱼米之乡,从宋代起,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在全国处于领先的位置。苏州经济繁荣、人文聚集,拥有代表性的苏州园林、吴门画派、吴歌、苏绣、宋锦、苏扇、评弹、桃花坞木版年画昆曲等吴文化形式。解放前,无锡只是常州府的一个县,大运河是无锡经济的命脉,推动无锡从明清时期到近现代成为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

大运河以强大的包容性和文化感召力,将沿线众多地域文化子系统有机地联结起来,促进了我国五大水系联通东西,贯通南北,加速了两岸人口迁徙、技术交流、商品物资、经济贸易,带动了大运河主轴及其周边支流水网的辐射区域的城、镇、村共生互融,也便利了江苏地域文化的交流、传播与融合,极大地促进了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互通,以及国际间的交流畅通。从历史发展来看,江苏五大文化区在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建筑形式、相应的建造技术、品类繁多的美食文化及形态各异的民风民俗,五大文化区美美共生,精彩纷呈,内涵丰富。然而江苏五大文化类型分区及其边缘交叉地带,形成各自分散的文化认同圈,大多数的地方分辖市之间不会主动地相互融合,甚至还可能因共同的传统文化资源而产生对立和冲突,亟待建立大运河文化“多样统一”的文化标识,重塑大运河文化品牌,将海量、分散于不同地区、不同水系名城名镇名村的文化记忆连接起来。

三、大运河江苏段沿线镇村文化记忆的当代建构

江苏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成立了省委书记、省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跨界联动相关部门,构建“1+1+6+11”规划体系,高站位、全省域统筹推进江苏省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江苏十三市全员加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范围。按照“水韵江苏”建设大运河美丽中轴的整体定位,大运河江苏段沿线镇村文化记忆的当代建构,从时

空、媒介、功能三个方面开展,以大运河“绿色生态带、璀璨文化带、缤纷旅游带”的立体思维,三位一体建设大运河和长江两大国家文化公园,整体有序地开展各项工作。

(一) 时空整合维系大运河镇村绿色生态带

大运河是一个复杂变化的水网生态环境和时空体系,大运河江苏段沿岸地区名城名镇名村聚落空间结构形成,与大运河水系之间存在着人水相依的关联性。修复与保护运河遗产资源、彰显大运河绿色生态,是大运河沿线村镇持续发展的底色。多年来,江苏省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法律法规,在全国率先出台、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水岸共生治理模式和控制举措。

一是历史研究,考古先行,摸清家底。结合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组织实施淮安清口遗址、镇江京口港、宿迁段沿线河工遗存等运河沿线重要考古;研究制订规范,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加大支持运河沿线村镇的遗产和遗址保护;厘清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村镇发展的历史脉络,系统编制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村镇的文化遗产空间布局地图。

二是规划引领,完善制度,整体保护。出台《大运河江苏段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暂行办法》和沿线各市实施细则,以及大运河两线范围内建设项目规范管理办法,引导运河沿线历史城、镇、村的生态环境与建筑风貌综合整治,重点实施如大运河里运河故道保护展示、洪泽湖大堤信坝遗址保护修缮等大运河遗产本体保护工程,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常州运河沿线工业文化公园、无锡大运河沿线桥梁亮化提升项目等,将运河遗产保护工作融入城乡建设提升和人居环境改善的过程中。

三是生态优先,机制创新,水岸共生。建立了跨界的沟通机制,深度联动,以大运河主线及其主要支流水系为脉络,沿运划定岸线保护区和控制利用区,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建设生态廊道、生态河道,串联起城乡绿地空间生态保护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及生物多样性,从城乡二元转向城乡融合的生态格局,将水岸空间真正还予人民。

大运河苏州段沿河两岸拥有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群,自古以来市镇密布、商业繁荣、人文荟萃、文化发达。其长度虽只占全运河总长度的1/22,但是其沟通长江、太湖水系,与塘浦圩田体系相沟通,构成联结城乡、通达全国的苏南水网,具备历史久、地势低、水源足、河道稳、货流量大、经济强等优势。西段和中段有

历史文化街区苏州古城和望亭、浒墅关、枫桥、横塘、越溪、木渎、光福、角直等古镇,南段则有松陵、周庄、同里、平望、芦墟、盛泽、黎里、震泽、七都等水乡名镇,“天光水色,一望皆平”^[21],河镇相生,大运河与其他河道水系一同将村镇空间划分出多组团的布局形态。如今,流经古城苏州的京杭大运河“黄金水道”水清岸绿、繁忙依旧,生产物资通过运河输送到全国各地,促进村镇生态系统可持续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 媒介融合激活大运河镇村璀璨文化带

大运河将地域性与世界性相链接,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联结,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上升到国家记忆的战略高度,将遗产保护、民族精神与国家命运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联性。人们既要在空间维度去理解,也要在时间的维度加以认知,村镇空间聚落化是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聚落空间的色调、特性、节奏等,都会影响到人们的空间感知,那些生活化的场景、形式、尺度、色彩、质感、风貌等,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逐渐变迁,成为人们内心永恒的乡愁。唤醒人们对大运河的时空记忆,需要将散落在大运河江苏段沿线名镇名村数量众多的文化遗产和地域文化,纳入拥有统一主题的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体系之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国家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特别突出的是其文化属性,集中展现了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文化标识“通、统、容、合”^[22]的文化精神内核,中国大运河成为承载国家形象和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巨型媒介。随着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媒介融合成为共建大运河文化记忆的支撑体系,包括生态、生产与生活空间的融合,以及拓展技术与业态、平台与市场、机构与产业等不同层面的融合,其间多种媒介形式并存,学科和技术壁垒被打破,需要进一步深化协同统筹的体制与机制改革。

江苏转变思想,率先成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并分别与13个城市共建分院,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其一,以运河文化为主线集聚资源,将不同区域的五大地域碎片化的文化遗产整合起来,系统而深度阐释了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村镇的文化内涵。对大运河沿线碎片化的物质、非物质文化记忆进行系统建构,协同共建了一个全区域、全方位、全民参与的大运河沿线名城名村名镇文化记忆数据库。其二,跨地区、跨部门、跨领域整合塑造出“水韵江苏”文化品牌这一独特审美感知。透过空间表面的信息,通过直接的五感知觉与内心的变化感受,立体完整、动态

掌握各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方面的多维发展指标,深度观察与理解判断大运河文化记忆的内涵、各层次属性及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凝聚成特定的心理模式与时代精神,影响到人们的心态观念和行为习惯。其三,整体构建大运河“全类型”数字化保护系统。健全大运河“全领域”数字化平台,全面提升大运河“全区域”数字化治理能力,多彩地呈现了大运河文化的文明价值和时代价值,大运沿线名镇名村的文化内生动力被激活,形成大运河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利用与沿线城乡人民生活品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融合的璀璨文化图景。2022年由江苏省承担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一期)项目正式上线运行,一个开放集成的智能化数字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呈现出来。

(三) 功能复合创新大运河镇村缤纷旅游带

大运河是融合的、创新的、共享的。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23](2019年2月)提出的“河为线,城为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思路,江苏印发了《世界级运河文化遗产旅游廊道建设实施方案》,实行多点联动,融会贯通,构建一条主轴带动整体发展、多点联动形成发展合力的空间格局框架,实现文化认同、社会共生的大运河文化共同体格局,为保障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大运河江苏段沿线镇村的建设,充分利用大运河本身贯通全国的水运优势和传统名城名镇名村地域文化特色优势,借助大数据、互联网、权威平台系统构架和新媒体传播渠道,将生态资源转化为自我造血的产业内驱力,推动大运河文化旅游与相关产业融合,联动大运河沿线城市与地区,与国际运河城市网络链接,创新“水韵江苏”文化品牌“1+N”的多元方式,形成一体化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缤纷旅游带。大运河江苏各地区凭借良好的区位优势 and 特色运河文化,发展生态绿色、低碳环保和循环农业,加快促进农村村庄环境建设,培育创意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打造运河文化名镇、名村、名业、名品,真正助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其一,乡土生态资源价值化。围绕村强民富、景美人 and 的总要求,江苏省委、省政府启动《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行动计划》,选取适宜的特色项目,统筹规划,制定标准,优化乡村资源,制定标准化工作流程,为建设美丽、健康、文明的特色田园乡村提供技术指导。长江、大运河在江苏交汇,通过对大运河沿线村镇资源禀赋的梳理,对村镇农业历史演进、人口迁移、技术革

新、水利设施、特色种植、文化遗址等资源要素做广度、深度普查,以水乡生态湖岛、田园景观塑造为导向,体现农事主题,打造多元场景。

其二,乡土农业产业特色化。特征研判,筑牢农业绿色发展的安全底色,选择适宜村镇种植的农产品,形成水稻、畜牧、水产、苗木等区域育种集群,农作、农文、农游、农研、农享场景多元创新;推出农产品品牌节系列活动,着力培育一批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盘活场地为核心、农业增收为支撑、旅游休闲产业为延伸的多元化产业发展模式。千百年来,大运河沿线乡村市镇体系成熟,造就了丝绸业、棉布业、粮食业、盐业、刺绣业、花木业等一个个根基深厚的产业村镇,并延续至今。比如自2018年以来,地处长三角中轴的常州市,迅速崛起了一批百亿级农业主体和新兴产业,其中“凌家塘市场作为全国领先、华东第一的农产品综合批发市场,年交易额超过400亿元,带动种养殖基地面积200多万亩,辐射长三角地区50多个县市”^[24]。

其三,乡土技艺传承常态化。乡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村宝贵的人文生态资源,主客体共同营造的运河文旅空间,通过定期举办培训班,让乡土文化与当代村民、市民“零距离”相遇,零散的工艺流程串珠成链,可以形成完整的乡村特色产业,不仅防止了村镇聚落的空心化,而且还能共同推动乡土技艺、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

其四,乡建主体参与协同化。打破学科与专业界限,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跨界协同攻关,文化与科技融合,激励多元社会主体参与,将具有独特符号的大运河文化品牌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重塑城乡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促进乡村文化与百姓的生态、生产、生活形成良性互动,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协调发展。

其五,乡村治理模式多元化。乡愁是人类共通的情感,理性与感性并存,通过主题活动,让大运河文化乡愁成为群体及社会团体的情感纽带,同时加大法律保护力度,健全“德治法治自治智治情治”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制度,相关职责部门系统协同部署,分步实施,建构多元的乡村治理参与路径,牵引民众情感期待,唤醒民众文化自觉,重塑传统文化价值,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四、结语

大运河北水系贯通促进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交融,大运河水系形态对于中国古代城市、镇、村等聚落的形成和布局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漕运促进了沿

运城乡的兴衰与繁荣,大运河水网形态、空间格局影响着人的审美感知。大运河对江苏来说更具有特殊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江苏的全域发展、城市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对大运河沿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传承利用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记忆工程,需要加强大运河沿线各个地区之间联合,促进各级政府间的合作与沟通,制定系统规划,加强保护措施,形成整体协调推进的机制,在更全面的视角下,统筹不同区域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加强大运河的文化保护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设计高质量的旅游路线和文旅项目,提升大运河的景观吸引力和知名度。只有通过强化各方面资源要素的协同合作,全面系统地推进各项工作有效地落实,使大运河沿线众多城市与镇村连珠成线,连线成片,最终得到全面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才能立体建成大运河“绿色生态带、璀璨文化带和缤纷旅游带”三位一体的空间发展格局,共建共享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参考文献

- [1] 黄杰. 建设大运河文化带的历史价值、时代意义与可借鉴的国际经验[J]. 档案与建设, 2019(2): 67-70.
- [2] 高蒙河. 长江下游考古地理[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3] 陈月秋. 太湖成因的新认识[J]. 地理学报, 1986, 41(1): 23-31.
- [4] 徐光来, 许有鹏. 城镇化背景下平原水系变化及其水文效应[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6.
- [5] 段进, 季松, 王海宁. 城镇空间解析: 太湖流域古镇空间结构与形态[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
- [6] 李百浩, 万艳华. 中国村镇建筑文化[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8.
- [7] 刘建臻. 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8.
- [8] 姜传杰. 运河遗产话淮安: 珍藏版[M].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16.
- [9] 张翠英. 大运河文化[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9.
- [10] 张英霖. 考辨苏州[M].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6.
- [11] 朱建达. 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规律: 未来规划设计的新理念、新方法[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4.
- [12] 许嘉璐. 中国古代礼俗辞典[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1.
- [13] 汪小洋, 周欣. 江苏地域文化导论[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8.
- [14] 丁援, 马志亮, 许颖. 文化线路在中国[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20.
- [15] 彭云鹤. 明清漕运史[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16] 孙承泽. 天府广记[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4.
- [17] 蔡铁山. 黄河历史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 [18] 王长俊. 江苏文化史论[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19] 周欣. 江苏地域文化源流探析[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0.
- [20] 周岚, 朱东风, 于春, 等. 江苏城市文化的空间表达: 空间特色·建筑品质·园林艺术[M]. 2版.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11.
- [21] 吴江县地名委员. 江苏省吴江县地名录[M]. 苏州: 吴江县地名委员会, 1983.
- [22] 夏锦文.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 促进沿运城市协调发展[J]. 群众, 2020(1): 46-47.
-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2019-05-09)[2023-05-08].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05/09/content_5390046.htm.
- [24] 殷雨晨. 看, 希望的田野充满活力——常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走在前列[N]. 常州日报, 2022-09-30(A02).